

论道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长三角有四重独特优势

宋蕾

作为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创新的前沿阵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通过制度创新和项目建设“双轮驱动”,不断打造一体化发展“试验田”和“样板间”,在协同推进长三角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方面形成自身独特优势,并将发挥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贯彻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大国家战略过程中,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我国绿色低碳发展创新的前沿阵地。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通过制度创新和项目建设“双轮驱动”,不断打造一体化发展“试验田”和“样板间”,在协同推进长三角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方面形成自身独特优势,并将发挥重要示范引领作用。

展。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的关键在于“协同”,这不仅是指区域共建的协同,而且更强调生产发展、生态良好、生活品质的有机融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也不是追求单一“绿色”,而是打造“生态优势转化新标杆、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一体化制度创新新实验田、人与自然和谐宜居新典范”。《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数报告(2022)》显示,2021年长三角水质优良断面比例较2018年上升9.6个百分点,PM_{2.5}平均浓度较2018年下降26.2%;同时,长三角以3.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8.1%的GDP增速,以占全国16.7%的能源消费总量产出了24.1%的GDP、26.6%的税收收入和21%的城镇就业人口,真正做到了“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均有利于长三角地区通过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路径,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太阳能、生物质能等领域具有优越资源禀赋和良好发展基础,是我国分布式光伏的主要发展地区和分散式风电最先发展地区。在氢能、储能等方面的碳中和技术也领先全国。长三角地区优先开展分布式可再生能源资源利用,协同推进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布局,切实降低化石能源比重,开发潜力巨大。2022年8月出台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实施方案》和《水乡客厅近零碳专项规划》,将汇集长三角地区优势资源,通过全生命周期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8.1%的GDP增速,以占全国16.7%的能源消费总量产出了24.1%的GDP、26.6%的税收收入和21%的城镇就业人口,真正做到了“常青树就是摇钱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些均有利于长三角地区通过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路径,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求,围绕打造生态优势转化新标杆的战略定位,努力推动示范区生态产品价值转化项目引领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及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双提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重点在于,以推动生态要素和产业要素的融合共享,创新协同发展模式。一方面,要求加强生态系统保护恢复,通过构建山水林田湖草沙的共生关系和自然生态系统整体性提质增效。浙江、安徽两省联动实施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试点,开创我国建立跨省流域上下游生态补偿机制的先河,从源头控制污染,走上互利共赢之路。另一方面,要求尽量将优质且稀缺的生态资源转化为生态产品,在制度安排下转变为资本,实现生态资源的保值增值。近年来,长三角江南水乡也积极探索“古村落+”、“文化+”、“数字+”相互促进的生态产业体系,以数字经济、农业产业、文化产业等多产业协同模式,赋能生态资源,积极引进新业态,助推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价格政策和标准体系。《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方案》提出,将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打造成为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的先行区、气候投融资和碳金融应用的实践区、绿色产业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的试验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积极探索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大力发展绿色金融产品,建立绿色信息共享机制。2020年,我国开始陆续推出“转型金融”试点,浙江湖州、衢州等城市成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多个长三角城市不断开展绿色保险创新发展实践,涌现多种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保险模式,包括“湖州模式”、“宁波模式”、“衢州模式”等。上海各项金融要素齐全,与香港、伦敦等主要金融中心互联互通,积极创新碳衍生品、挂钩债券、碳信托等金融产品,发展碳排放配额质押登记等业务,全面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2022年6月《上海市浦东新区绿色金融发展若干规定》出台,加快了上海国际绿色金融枢纽建设。上海、浙江等地绿色金融实践中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可以在协同推进长三角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

从长江经济带看创新雁阵

王振



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驱动力空间布局,总体呈现出非均衡化、梯度化的空间特征。具体来看,其一,由东而西,整体上驱动力显著梯度减弱;其二,长三角、长江中游、成渝三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或中心城市,驱动力集聚明显;其三,长三角城市群具有多中心特征。长江经济带的雁阵具有非常显著的雁阵特征,上海作为超强驱动力城市被定义为头雁城市,南京、武汉、杭州、苏州、长沙、合肥、成都、重庆作为强驱动力城市是重要支点城市,宁波、无锡、芜湖、南通、常州、嘉兴、镇江、扬州作为较强驱动力城市是重要节点城市。从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载体、科技创新产出、科技创新绩效四个维度来看,头雁城市比支点城市更有突出优势,支点城市比节点城市展现出明显优势,节点城市相较于其他城市,也有一定优势性,所以要突出重要城市集聚与创新作用。

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长江经济带人才创新雁阵,要遵循客观规律,发挥各地比较优势,需要做到以下6点。第一,着力增强和造就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头雁功能;第二,着力在南京、武汉、杭州、合肥、长沙、成都、重庆等重要支点城市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新型创新平台;第三,在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城市群三个国家级创新方阵;第四,在各个重要城市,深入开展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进一步激活化活力;第五,发挥各地比较优势,建设科技创新共同体;第六,构建区域利益协调机制,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带动各地发展。

从国内大循环看长江经济带

张学良



从国内大循环看,应把长江经济带放在国内大循环视角看长江与黄河之间的联系。由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增长极所串联形成的沿海经济带构成了我国的南北发展主轴,由长江经济带的成渝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所串联形成的长江经济带则构成了我国的东发展主轴,共同构成“钻石-菱形”空间协同发展格局;伴随着国际经贸秩序由“海权”向“陆权”并力转移,中西部地区发展与增长潜力不断增强,以中西部的武汉、成都和重庆以及黄河流域的郑州和西安五个国家中心城市为支点共同打造的成长极构成中西部地区小“钻石-菱形”,迎来新的重大发展机遇;地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两大国家战略连接处的“中原-长江经济带走廊”正是两大战略的交汇地。

此外,长江经济带内部的联动体现在城市群与都市圈等板块区域之间的联系。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双城经济圈与其他成长型城市群加强合作,如中西部成渝从“双城合作”走向“双圈合作”。长江经济带发展要擅于利用市场的力量,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作用,以科技链、创新链、金融链、供应链在长江经济带的分布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以上观点选自“第五届长江经济带发展高端论坛暨2022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发展指数报告发布会”上的专家发言

协同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路径优势

第一,具有协同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的路径优势。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协同推进区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先发优势

第二,具有协同推进区域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先发优势。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立足我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先立后破,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长三角在分布式能源发展利用方面起步较早,在核能、风能、

协同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转化优势

第三,具有协同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转化优势。二十大报告要求,要健全自然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市场化配置是引导各类资源要素向绿色低碳发展集聚的有效方式,但资源环境多属于公共产品,需要政府积极引导和规范。《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实施方案》要

协同推进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深度融合的枢纽优势

第四,具有协同推进绿色金融和绿色产业深度融合的枢纽优势。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离不开政策保障。

锐见

高等教育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支撑,要自觉增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担当,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应用技术型高校更应瞄准自身“赛道”,发挥特色优势,奋力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教育强国注入“新动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高等教育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战略支撑,要自觉增强“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担当,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应用技术型高校更应瞄准自身“赛道”,发挥特色优势,奋力培养应用型人才,为教育强国注入“新动能”。

在建成网络强国、构建数字中国的征程中,制定成熟的数字规则、规划、标准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离不开制度型开放的深入推进,这也是实现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当今中国正由“网络大国”向“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迈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这离不开制度型开放的助力。二十大报告强调要“稳步扩大规则、规划、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中国积极参与数字技术领域的国际规则与标准建设是践行制度型开放、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举措。因而,亟需以制度型开放为抓手,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为何离不开制度型开放

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与制度型开放联系紧密。一方面,构建高水平的国际数字规则、规划与标准成为一个国家具备强大数字技术实力的重要表现。在数字规则与规划层面,美国如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CCDCOE)长期围绕网络战、网络空间国际管辖权等领域开展规则建设,已发布两版《塔林手册》。西方还通过建立全球网络空间稳定委员会(CGSC)等专门机构,聚集了诸多包括非国家行为体在内的利益攸关方,

奋力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 为教育强国注入“新动能”

谢华清

人才,为教育强国注入“新动能”。

融入新发展格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站在两个百年交汇点,高等教育要胸怀“国之大者”,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融入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新发展格局中,坚持问题导向,厘清发展定位,明确发展目标,开拓适合发展的新空间。“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以及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也从根本上要求高校必须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应用技术型高校而

言,要秉持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扎根中国大地,切合地方需求,结合自身办学条件和办学特色,适时抓住服务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机遇,顺势而上,把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放在自己发展的力量基点上,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强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打好“引育用”组合拳,推进人才强校战略

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没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就很难培养出高水平的创新人才,也很难产生高水平的创新成果,而人才的自主培养是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推进人才强校战略,仅仅依靠引进人才是

远远不够的,还要打好“引育用”人才培养组合拳,让人才与岗位同频共振,实现人才培养与学校发展同向同行,双向提升。

应用技术型高校推进人才自主培养,首当其冲的是要不断加大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青年骨干人才引进力度,大力引进具有企业实践经验和国际视野的优秀人才。当然,引进领军人才、学术带头人、“双师型”教师的同时,更要在这些青年骨干的“引育用”上下功夫。比如,在人才引进的同时,还要注重培育青年优秀人才,并关注不同层次人才梯队渐进式培养。人才引进来,培养好后,还要“适岗适任”,将优秀人才用在合适的岗位上,让他们在岗位上不断成长、不断提升能力,让人才的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

瞄准应用型高校“赛道”,不断增强创新能力

“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入推进,科技创新驱动已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途径。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新型工业企业对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应用技术型高校如何找到一条合适的发展赛道,培养具备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应用型创新人才,成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以培养动手能力,有责任担当和国际视野人才的应用技术型高校要抓住时代提供的机遇,瞄准自身的赛道,找准发力点,不断增强创新能力,在自己的赛道上绽放精彩。具体而言,要下好先手棋,围绕国家、上海市重大战略需求做好学科专业布局与调整,比如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等专业群设置;要修练好“内功”,紧紧围绕应用型特色学科建设,牢牢抓住特色学科平台,依托优势学科与专业群,跑出创新加速度;要巧借外部“活水”,强化与产业、社会的联系,开展协同创新研究,增强学校的整体创新能力,实现“弯道超车”。

(作者为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教授)

以制度型开放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

耿召

对全球数字规则治理走向产生重要影响。纵观数字技术国际发展标准,能否主导前沿技术走向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国家的技术实力所决定。是一个国家在前沿技术上取得突破,及时弥补技术空白,就能够占据先行者优势,进而在国际制定中把握先机。美西方长期主导国际标准体系建设,在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等国际组织中占据优势。因此,大国在深度推进数字技术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亟需鼓励本国深入参与全球数字规则与技术标准治理体系,凭借自身强大的技术实力引领国际规则标准治理走向。

另一方面,具备构建高水平且富有吸引力的数字规则规划标准的能力,能够推动大国赢得科技竞争,在全球数字产业发展和数字治理体系中占据优势。数字技术国际规则、规划、标准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数字规则与规划涉及更多非技术要素,关乎国家主权、安全、经济、文化等层面的外在变量影响着规则规划的发展方向。凭借强大技术实力,大国在构建数字规则中体现出其价值理念。反之,规则的生成与发展也助推大国技术实力的

增强,促进数字治理理念影响力的提升。而数字技术标准根植于市场化实践,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发挥关键作用。大国需要具备高水平的研发能力,能够培育成熟且广阔的市场。大国构建的标准体系经过市场检验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与认同,进而有助于标准发起国在大国竞争中占据优势。当下,科技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场域,某些大国凭借自身在技术规则与标准中的优势,试图通过出台排他性技术法案、构建“小多边”技术协作体系等方式遏制其他国家。因而在提升关键技术水平的同时,增强技术规则标准治理能力就成为突破外界技术围堵的关键。

以制度型开放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可行之道

围绕网信事业,以制度型开放推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中国可采取以下策略:首先,中国应在推进技术研发过程中,紧抓数字技术加速迭代而形成的规则标准窗口期,构建高水平国际规则与标准体系。技术的迭代与演进是一个动态过程,与之相伴的规则标准建设亦不断演进成熟,人工智

能、量子技术、交互技术等数字前沿技术的涌现为中国弯道超车、赢得数字领域国际制度主导权带来诸多机遇。近年来,中国加快布局数字产业,着力提升数字治理能力。“十四五”规划提出:“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因而推进制度型开放也需与数字产业化及产业数字化转型发展紧密结合。中国在推进制度型开放中,需要政府、技术团体、数字企业等各方密切配合。中国也要以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等高标准国际协定为契机,全面对接高水平数字规则与标准,促进国家数字治理体系的成熟与完善。未来,中国在向世界提供前沿数字规则与标准的同时,拓宽数字技术产业国际市场占有率,为实现高质量发展,赢得高科技竞争塑造有力条件。

其次,在深入参与现有国际机制的同时,中国可尝试建立新的机制性机构。有效的国际制度是推进数字产业全球发展的关键,而成熟稳健的国际机制能促进全球数字制度走向成熟。近年来,中国深入参与国际电信联盟、国际标准化组织等权威机构事务中,承办相关国际会议,中国

籍专业人士也担任了相关组织的高级职务。像上海合作组织等中国发起的区域组织也尝试构建相关数字技术规则。中国也在建立国际专业化机构,世界互联网大会国际组织的建立就是有效尝试,该组织的成立顺应了信息化时代的发展潮流,呼应了国际社会深化对话与合作的呼声。未来中国需要密切追踪数字技术发展态势,围绕数字规则标准所涉及

的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经济、数字犯罪、数字医疗等领域形成高效协作机制,并紧密对接联合国、国际标准化组织等全球性、权威性的国际机构,以高水平开放促进自身领导力的提升。

最后,鼓励行业协会、数字企业对标高水平国际规则标准,深入参与全球数字治理体系。美西方国家的数字行业协会治理模式成熟,数字企业不仅掌握尖端技术,而且长期掌握国际标准话语权。美国商业软件联盟(BSA)、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ITI)、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等行业协会以及微软、谷歌、Meta等数字跨国企业均倡导构建符合数字规则与数字标准。因而中国在深度推进制度型开放中,鼓励本国行业协会积极参与与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等专业团体,培育本国企业参与相关规则标准机构,拓宽国际市场。数字时代技术生命周期日渐缩短,在标准制定与技术研发同步进行中,数字企业发挥了关键作用。因此,对标高水平规则,中国应鼓励相关行业协会、数字企业同步推进技术研发与规则标准建设,这也是践行制度型开放的重要举措。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讲师)